

清代今文经学新论

黄开国◎主撰

清代今文经学新论

黄开国◎主撰



策划编辑:方国根

责任编辑:段海宝 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今文经学新论/黄开国 主撰.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ISBN 978 - 7 - 01 - 017437 - 2

I. ①清… II. ①黄…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Z126.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5724 号

清代今文经学新论

QINGDAI JIN WEN JINGXUE XIN LUN

黄开国 主撰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2.25

字数:67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437 - 2 定价:10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	1
第一章 清代今文经学缘起新探.....	14
第一节 从经学发展看清代今文经学的出现	15
第二节 从社会原因看清学的兴起	19
第三节 所谓“复西汉之古”	26
第四节 照着说向接着说的转变	31
第二章 重大义的照着讲.....	35
第一节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	35
第二节 赵汎对清代今文经学出现的影响	43
第三节 庄存与首重今文经学	49
一、庄存与的独特人生历程	49
二、重春秋公羊学的经学取向	52
三、对经学大义的发明	64
四、庄存与经学的意义	72
第四节 孔广森的春秋公羊学	76
一、探求《春秋》“新意”	77
二、评说历代《春秋》学	94
三、孔广森春秋公羊学评价	99
第三章 重微言的照着讲.....	107
第一节 庄述祖首重微言	107

一、发明古籀的以汉学为根株	108
二、始重微言的说经宗何休	111
第二节 刘逢禄与庄氏家学	119
一、刘逢禄的家世	120
二、庄氏外家之学的熏陶	124
三、其他学术的影响	129
四、刘逢禄的著述与代表作	133
五、《春秋公羊经释例》	136
第三节 以“三科九旨”为核心	139
一、刘逢禄“三科九旨”说	139
二、三科的经学微言阐发	141
三、“九旨”为主的书法发明	156
四、《春秋》制的发明	164
第四节 否定古文经学	169
一、不完全否定古文经学	170
二、完全否定古文经学	174
三、重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177
第五节 以《公羊》“三科九旨”说《论语》	204
一、以《公羊》说《论语》的依据	204
二、《论语》的《公羊》义理化	207
第六节 刘逢禄重微言的历史意义	217
一、世运学风的转移	218
二、经世致用的价值与局限	223
三、常州春秋公羊学派的形成	229
四、刘逢禄在清代经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235
第四章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过渡	241
第一节 宋翔凤的孔子素王说	241
一、宋翔凤的生平大略	242
二、《论语说义》的今文经学概说	243

三、宋翔凤的孔子素王说	250
第二节 龚自珍的现实批判	258
一、龚自珍的家世、生平与师友	259
二、对衰世的抨击	265
三、龚自珍经学的基本观念	268
四、龚自珍的春秋公羊学	276
五、评议经学纷争	288
六、龚自珍经学的评价	292
第三节 魏源向西汉今文经学的完全回复	304
一、“默好深思”的一生	305
二、晚清经世派的杰出思想家	312
三、《诗古微》的以西汉为宗	322
四、《书古微》的回复西汉	383
五、魏源的其他经学思想	407
六、魏源经学评说	415
 第五章 尊孔尊经的接着讲	420
第一节 廖平的学术道路	421
一、廖平青少年的二次思想转变	421
二、经学六变时期	428
第二节 廖平的经学六变与发展逻辑	432
一、经学六变的基本内容	433
二、经学六变的发展逻辑	435
第三节 廖平的孔子改制说	439
一、构建经学理论前的孔子改制说	439
二、构建尊孔尊经经学理论时的孔子改制说	445
第四节 尊孔尊经的经学理论	452
一、孔经人学的发明	452
二、孔经人学与近代古今中西之争	461
三、孔经天学的发明	469

四、六书文字为孔子所造说	478
第五节 廖平的尊孔尊经经学理论与经学的终结	483
一、经学与近代社会	483
二、廖平经学的内在矛盾	485
三、廖平经学理论的历史义蕴	488
第六章 康有为维新变法与维新变法以后的接着讲	491
第一节 康有为的家世与生平	492
一、康有为的家世	492
二、康有为的一生	493
第二节 康有为早年无今文经学观念辨	501
一、《教学通义》无今文经学辨	502
二、《民功篇》亦无今文经学观辨	518
第三节 维新变法时期的接着讲	526
一、《新学伪经考》攻刘歆作伪	527
二、《孔子改制考》对孔子的神化	534
第四节 “两考”与“两篇”的比较	546
一、《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比较	546
二、《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比较	559
三、康有为“两考”与经学的终结	573
第五节 戊戌变法以后的接着讲	580
一、新道德进化论的新经学	581
二、对春秋公羊学三世说的新发挥	598
三、中国与世界的三世发展	611
四、大同说的人类理想	620
主要参考文献	652
索引	659
后记	670

绪论 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以某种形式开端，也常常以某种形式结束。中国经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出版的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第二卷专论经学时代，以汉代的今文经学为经学的开端，清代的今文经学为经学的结束，并分别以西汉的董仲舒、晚清的廖平为经学开端与终结的代表人物。尽管经学的开端与结束都以今文经学的形态表现出来，但作为经学结束的清代今文经学，绝不是汉代今文经学的简单回复，而是蕴含了汉代以来整个经学发展的内涵。所以，对清代今文经学的讨论，绝不仅仅只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的宏大课题。只有站在把握整个中国经学史发展的历史高度，才可以高屋建瓴地对清代今文经学作出公正的评说。

按照公认的看法，清代今文经学开始于乾隆年间的庄存与，但从庄存与到晚清的光大，清代今文经学究竟经历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特点如何，学术界是存在异议的。准确地划分清代今文经学发展阶段，是研究清代今文经学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若没有对其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就难以对清代今文经学作出合于历史事实的说明。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而言，主要有三阶段说与两阶段说，同为三阶段说或两阶段说，其具体论说也有所不同。而无论是已有的三阶段说，还是两阶段说都有一定依据，但又不是对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准确说明。

两阶段说的主要代表是周予同先生，其说见于《中国经学史讲义》上

篇论“清学”的第七章。该章认为“清学，又称朴学、汉学、汉古文学（但也包含今文经学）”^①，这一说法至今依然为许多研究清代今文经学的论著所沿用。但是，清学、朴学、汉学、汉古文学、今文经学相互间并不是相通的。说乾嘉汉学为朴学是正确的，从乾嘉汉学与东汉古文经学在经学上有相近之处，以汉古文学相称也有一定道理，以朴学、汉古文学所称的清学，实际上只是指以文字训诂、名物考辨为主的乾嘉汉学，而非整个清代经学。此意义的清学是不可笼统称为汉学的，更不能说包含今文经学。周予同先生关于清学的这一界说，实际上说的是整个清代的经学，而非仅仅是乾嘉汉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清学的发展分为启蒙期、全盛期与后期三个阶段，而以常州学派为清学发展的后期。常州学派又被他称为“公羊学派、清今文学派”^②，并由此提出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两阶段说：“前阶段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后阶段有龚自珍、魏源、郝懿辰、戴望、廖平、康有为等。”^③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点主要有：其一，前阶段“偏于纯学术，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④，后阶段则“提倡通经致用”^⑤；其二，前阶段“都是专经（分经）研究，不作通经研究”，后阶段则作“综合性研究”、“通论式的综合研究”^⑥。周予同先生看到了清代今文经学不同阶段的一些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并没有抓住区分两个阶段的根本。通经致用是今文经学的最重要理念，通经致用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以“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目的，正是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突出表现；既然以前阶段的“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就不能说是“偏于纯学术”。而专经、通经研究的不同只是研究范围广狭的问题，绝不是区分两个阶段的实质所在。至于以清代今文经学派等同于常州学派、公羊学派，以龚自珍、魏源划归为后期的代表人物，也是值得推敲的。尽管周予同先生的论说，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关于清代今文经学两个

①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0页。

②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8页。

③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8页。

④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8页。

⑤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页。

⑥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页。

阶段特点的说明，确实揭示了两个阶段的某些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周予同先生既从政治上，又从学术上来说两个阶段的不同，提供了全面探讨两个阶段不同的正确方向。

章权才教授在《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一文，也主张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两阶段说。但他的两阶段说是把常州今文经学分为一段，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为一段。章权才的着眼点是今文经学在这两个不同阶段上所代表的不同阶级，以及所起的不同社会作用。所以，他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重点揭示了康有为把“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经学”，“改造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工具”。^①论常州学派，也强调常州学派与政治的联系，说“常州今文学派是嘉道之际，即鸦片战争前夜活跃在常州地区，以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为代表，以挖掘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重点，旨在推进政治改革的一个学派”^②。庄存与、刘逢禄并不讲政治改革，龚自珍的社会批判与魏源的经世致用，也并不与其今文经学直接相关，所以，以“政治改革”来定义常州学派的特色，是值得商榷的。在常州学派中，章权才又将其分为“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兴起阶段以庄存与为代表，经学特色是重视《春秋》；发展阶段以刘逢禄为代表，经学特色是重视《公羊》中的‘微言大义’；创新阶段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经学特色是由学术引向政治，力主改革时弊”^③。《春秋》有三传之分，庄存与重视的是其中的《公羊》今文学，仅说他重《春秋》，就忽略了三传今古文的区分；微言与大义是不同的，笼统地说刘逢禄重微言大义，则没有抓住刘逢禄重“三科九旨”的经学微言的特点，亦非确论。说龚自珍、魏源将今文经学引向政治，同样缺乏根据。章权才教授的划分过分重视政治的意义，忽略了经学学术在区分两个阶段中的作用。同时，与周予同先生将龚、魏划归为后阶段不同，章权才教授将龚、魏归为前一阶段。这一不同处理，反映了周予同先生与章权才教授对龚、魏经学的不同认识。但章权才教授将龚自珍、魏源划归为前阶段，这较之周予同先生将龚、魏归后阶段，更符合二人今文经学的实际。

^① 章权才：《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章权才：《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章权才：《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2期。

三阶段说以丁原明教授与董铁松教授为代表。丁原明教授在《清代今文经学浅论》中，将清代今文经学分为复归期、托经议政期、维新变法实践期的三个阶段。复归期以庄存为其开创性的人物，而真正的奠基者则是刘逢禄，这一时期今文经学的“总的特点是从学术上反对东汉古文经学，而向西汉古文经学复归，它的代表人物对当时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未能把‘公羊学’引向现实政治并使之成为改良社会的思想武器”^①。托经议政期以道光、咸丰间的龚自珍与魏源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今文经学“带有鲜明的现实政治倾向”，“他们从今文经学中汲取的只是‘微言’精神，并用以思考当时内忧外患的实际问题，从而展现了一代志士关心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但是，他们的“改良主张尚停留在理念中，未能付诸实践”。^②维新变法实践的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这一时期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不仅在理论上与西汉的今文经学，而且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的今文经学有本质的区别，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从言政议政发展到与社会运动相结合”^③，代表着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高峰。丁原明教授的分法重视的是今文经学与政治实践的联系，而忽略了其经学自身的变化特点。董铁松教授在《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历史作用》一文中，也是分为三个阶段，在时间与代表人物上都与丁原明教授的分法相同。不同的是，他将三个阶段又称为“三种境界”，不仅从与政治的联系，而且从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来说明清代今文经学在三个阶段的区别，对丁原明教授之说有所补充。此外，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第一阶段的特点，两人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丁原明教授以回避政治为说，董铁松教授则说具有“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是对现实忧患——经世意识的一种委曲表达”的“忧虑和批判意识”。^④仅就此而论，丁原明教授的说法较合符清代早期今文经学的实际。

① 丁原明：《清代今文经学浅论》，《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② 丁原明：《清代今文经学浅论》，《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③ 丁原明：《清代今文经学浅论》，《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④ 董铁松：《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历史作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二

三阶段说与两阶段说的最大不同，是将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认为他们经学的特点是托经议政，与这之前的刘逢禄等人相区别，但又不同于后来的廖平、康有为，故应划归为另一阶段。此说源出梁启超，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二次申论此说：

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①

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议论（未刻）。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②

梁启超是一代学术宗师，《清代学术概论》是他的名著，该书提纲挈领、高屋建瓴，对清代学术作出了具有诸多卓见的论说，对研究清代学术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提出诸多可谓不刊之论。但是，在一些具体论述上，并不是梁启超的所有说法都是正确的。至少关于龚自珍、魏源的经学“喜以经术作政论”说法，就查无实据。

尽管龚自珍、魏源都是刘逢禄的学生，龚、魏也是很好的朋友，学术界也喜龚、魏连论，但龚自珍与魏源在经学上有很大的差别。在经学上较为信守刘逢禄学说的是魏源，而不是龚自珍。龚自珍的经学著作，涉及今文经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学的部分是少数，只有《大誓答问》、《春秋决事比》、《五经大义终始论答问》三书。《大誓答问》主要是《大誓》真伪的考辨之作，以论证汉初所传今文《尚书》实为二十九篇，非今文经学众口一词的二十八篇；而《春秋决事比》是通过答问的形式，借助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判、案件审理的讨论，来发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的精神；《五经大义终始论》借助春秋公羊学三世说的理论形式，阐发了以食货的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观。^①这三部著作确实是在讲今文经学，但却没有发现引经议政、批评时政的内容。龚自珍批评现实政治最著名的著作是《乙丙之际著议》，著于25岁时，而龚自珍师从刘逢禄“改从”今文经学是在28岁时。也就是说，龚自珍的批评时政主要见于他早年的著作，而非他后来的今文经学著作中。龚自珍其他批判现实的论著，也都与经学无关。

魏源较为恪守刘逢禄的今文经学，《诗古微》、《书古微》是他今文经学的代表作，但魏源所发“古微”，主要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这两部书的“序”都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书古微》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②“《诗古微》何以名？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③。这两部书都以发明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为目的，并不涉及对讥切时政的问题。

读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著作，并没有发现所谓以经术作政论的情况。龚、魏并没有将今文经学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他们关于今文经学的著作，都仅仅是对西汉今文经学相关问题的考辨与义理的说明，而没有与时代相结合的创新。梁启超虽然说龚、魏以经术作政论，但并没有证实这一点。他用来论证龚、魏以经议政，所列的《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元史》、《海国图志》，没有一部属于经学类的著作，而都属于史部的著作。这说明，梁启超虽然提出龚、魏以经议政之说，但并没有从龚、魏的经学著

^① 请参见黄开国：《龚自珍的五经大义终始论》，《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魏源：《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9页。

^③ 魏源：《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9—120页。

作中找到以经议政的根据，而只能文不对题地以二人的史学著作，来“证明”龚、魏的以经议政。同时，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著作，在治学方法上都带有清代朴学的明显影响，是按照朴学的治学理路来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明，这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与后来廖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带有明显的不同。

尽管梁启超之说是缺乏根据的，但人们论龚自珍、魏源的经学，却常常以此说为准线。而后人论述龚自珍、魏源讥切时政等说，所引材料也出于二人的今文经学著作之外。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一直存在与龚自珍、魏源经学的研究中。龚、魏的著作确有讥切时政的内容，重视经世致用，但这些内容都出于二人的经学著作之外。

丁原明、董铁松二位教授的三阶段说在划分晚清今文经学时，将龚自珍、魏源视为托经议政阶段的代表，实际上袭用梁启超之说。尽管学术界论龚、魏今文经学，多据梁启超之说，但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著作表明，没有以经议政的内容，基本上是刘逢禄今文经学的延续与扩展，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所以，将龚自珍、魏源的经学说成是清代今文经学的一个独立发展的阶段，认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实难成立。

三

相对而言，两阶段说较之三阶段说，比较符合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实际。但是，这两个阶段如何划分，其主要代表人物在经学上的不同特点，本书与周予同、章权才的看法又有所不同。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两阶段，用现在时下的话语说，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照着说”与“接着说”的差别。用传统的话语说，也就是作述之别，“照着说”是述，“接着说”是作。“述”是对已有历史事实的陈述，没有时代内容的创新；“作”是对已有历史的发展，具有崭新时代内容的创新。

从庄存与到魏源，属于“照着说”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确如章权才所说存在三个小阶段的变化。但三个小阶段的名目与具体变化，称为开创期、复归期、扩展期更为恰当。庄存与为开创期的代表，是清代最早讲今文经学的经学家。他主要生活在“家家许、郑，人人

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①的乾隆年间，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乾嘉汉学的空疏无用，力图在乾嘉汉学以外寻求不同的历史文化资源，来矫正清代朴学的弊端。庄存与找到了春秋公羊学的今文经学，著为《春秋正辞》，虽然这部书没有彻底摆脱自郑玄以来兼采三传的传统，但已经表现出以阐发《公羊》义理为重点的新特点。打破了乾嘉汉学尊奉东汉古文经学的风气，开启了重视西汉今文经学的新方向。比庄存与稍晚同时代的孔广森，也著为《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明确以《公羊》为本。尽管在实际上孔广森依然兼采三传，但在朴学盛行之时，公开以发明《春秋公羊传》为其书名，加上他圣人后裔的身份，其意义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开创期经学家的重《公羊》，还没有完全以《公羊》为宗，都带有兼采三传的特色；他们真正重视的是今文经学的大义，即经典所阐发的经学政治、伦理原则，而不是经学的微言。复归期以刘逢禄为代表，这时的今文经学才完全以《公羊》为宗，并由重大义转到了重微言。刘逢禄不仅以“三科九旨”的经学微言为经学的根本，并用以遍说群经，以《左传》为刘歆作伪的产物，非解《春秋》之书，重启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奠定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基础，真正实现了向西汉今文经学的复归。扩展期的代表是龚自珍、魏源，魏源将今文经学的发明从《春秋》扩展到《诗》、《书》，著为《诗古微》、《书古微》，发明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的微言大义，拓展了今文经学的领地；龚自珍则是清代第一个借公羊学的三世说来阐发自己社会历史观的经学家。

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尽管有三个小阶段的变化，但其中有共同不变的东西。具体说来，在该阶段上的今文经学都具有共同三个特点：

第一，在治学方法上，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清代朴学惠氏吴派重家法的治经方法，刘逢禄是这样，宋翔凤是这样，龚自珍、魏源也是这样，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公羊春秋何氏释例》、《诗古微》、《书古微》无不如此。由于清代朴学在治学方法上接近古文经学，所以，深受朴学治学方法浸染的这些今文经学或多或少都带有肯定古文经学的倾向。如庄存与、孔广森等都兼采三传，庄述祖、刘逢禄在尊崇西汉今文经学的同时，也推许综合今古文的大师郑玄，魏源则承认古文经学的《毛诗》与今文经学的三家《诗》同出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一辙，《书古微序》还肯定西汉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皆有圣人的微言大义，龚自珍的著作更有不少属于古文经学或肯定古文经学的说法。^①

第二，在经学内容上，他们讲的今文经学，都是按照汉代的今文经学的师法原则，力图去恢复其原貌。他们发掘了为人们忽略了两千来年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但是，他们还没有利用讲求微言大义的形式，去讲出有时代意义的新东西。照梁启超的说法，他们只是复西汉今文经学之古，这对人们认识今文经学特别是消沉两千来年的春秋公羊学有极大的意义。但是，从学术精神与范式上说，还是乾嘉汉学的范畴，属于对以往学术的考证、发明，只是考证、发明的内容不同，乾嘉汉学的考证、发明重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而刘逢禄等人考辨、发明的重点则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义理，内容虽然不同，但都是对以往历史文化的发明。

第三，就这个阶段的今文经学精神实质而言，还只是一种与现实政治没有直接联系的理论，只是从书本来发明西汉的今文经学，缺乏西汉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真精神，只可以称之为一种学问，属于从书本到书本的纯学术研究。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阶段中宋翔凤、龚自珍、魏源今文经学的独特意义，不能将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与庄存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等同视之，而应该注意到他们的不同。宋翔凤以孔子素王说为公羊学的核心，统宗公羊学，不再是刘逢禄的重三科九旨^②，对后来廖平、康有为借孔子改制说来建立起经学理论有较大影响，为接着讲的今文经学找到孔子改制说这一最适合的理论形式；龚自珍、魏源的其他著作确有批评现实、讥切时政、重视经世致用的内容，以及他们论及经学的独特时代特点。龚自珍借三世说，以言五经大义，提出以食货的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是借用《公羊》学的三世说的理论形式，来阐发自己的社会发展理念，实已启后来廖平、康有为借公羊学的理论形式以言己说之端绪。魏源的《默觚》

^① 参见黄开国：《龚自珍的尊史说》，《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影响》，《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② 有的论著早已指出：“宋翔凤的经学是乾嘉汉学至道咸今文学转变中的环节。”（钟彩钧：《宋翔凤学术及思想概述》，《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4年版，第357页）

分《学篇》和《治篇》，强调学与治的结合，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的观念；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及其诸多与国计民生现实相关的著作，都表现出了将经学与现实相结合的新方向。确如梁启超所说，后来言今文者，多受到龚、魏此风的影响。所以，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虽然在总体上属于前一阶段，但同时又表现出与刘逢禄等人的很大不同，是向后一阶段过渡的中间环节。没有这一中间环节，就不可能很快有清代今文经学第二阶段的出现。

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二个阶段，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廖平从经学第二变开始，即以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来构建其尊孔尊经的理论体系，康有为受廖平经学第二变的影响，著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以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学来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他们的今文经学与龚、魏以前的清代今文经学相比较，已经不是梁启超说的复西汉今文经学之古的“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利用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的理论形式，来发挥其与时代相结合的新理论。

这个阶段的今文经学虽然以公羊学为依托，但绝不囿于其说，与前一阶段今文经学相比较，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第一，在治学方法上，他们根本不守公羊学的家法原则，也没有经学与其他学术的区分，甚至没有中学与西学的界限，而是将古今中西的各种学说都纳入他们的“经学”理论之中。乾嘉汉学的讲求实事求是，注重经学家法原则，重视文字训诂的学风，在廖平、康有为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他们都是从自己已有的观念为出发点，对经典作牵强附会的主观附会。所以，廖平、康有为虽然也以“考”名其书，著为《古学考》、《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但他们的考绝不是乾嘉汉学的考据，而是打着考据的名目，来附会自己的思想观念。故他们今文经学著作多牵强附会之说，以至连他们的弟子都毫不讳言。

第二，就所谓经学内容而言，廖平与康有为都是在今文经学的外壳下，打破古今中西的各种学说的界限，将一切思想观念、不同学说统统纳入所谓经学的范畴。他们的今文经学根本不是传统的今文经学，而是属于近代学术的范畴。与龚、魏以前清代的今文经学只是从书本发明历史上的今文经学相比较，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从内容上说，这个阶段的所谓今文经学已经是带